

稳定性体系下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李文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10期。

【内容提要】中国国家领导人有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得到美国高层的积极回应。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内挑战性与颠覆性元素明显减少，以“敌我分明”、“对抗和冲突”、“零和博弈”为特征传统大国关系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相互依存”、“亦敌亦友”、“竞争与合作并存”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探索形成大国关系的新模式，是未来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稳定性体系 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

引言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达成“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倡议中美之间应建立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¹2012年5月，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致辞：中美应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努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得到美国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等政要的积极性回应。奥巴马强调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向世界证明，中美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覆辙。”²希拉里则宣称：中美关系“不是像敌友那种黑白分明的关系”，“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³

中国学者注意到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新变化。1999年，李义虎指出：在后冷战时代，大国之间出现了“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形式。这种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伙伴化”预示着国际关系将进入和平、合作和发展的新阶段。⁴2011年，刘强指出：大国关系已由一种传统的利益趋同或利益相悖的简单或敌或友关系，逐渐演化成一种既存在共同利益又存在利益竞争的非敌非友的模糊复杂的博弈关系模式。⁵秦亚青也认为：“冷战后大国关系出现了一种既非对抗、又非结盟的协调性伙伴关系的新动向。”⁶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全面把握传统大国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探索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¹ 杨洁篪：《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努力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纪念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求是》2012年第6期。

²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Vice President Xi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2/14/remarks-president-obama-and-vice-president-xi-peoples-republic-china-bil>

³ “Remarks at the U.S. Institute of Peace China Conference”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3/185402.htm>,

⁴ 李义虎：《论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5期。

⁵ 刘强：《新型大国关系下的国际安全—2010年全球安全形势综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1期。

⁶ 秦亚青主编：《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本文认为，近代以来，大国关系经历了二战之前的以“对立与战争”为主的时期、冷战期间的以“对峙与竞争”为主的时期，以及冷战结束后的以“竞争与合作”为主的时期。前两个阶段为革命性国际体系下大国关系，后一个时期为稳定性国际体系下“新型大国关系”。⁷

近代初期，成为霸权国的重要标志在于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的强大。随着时代的发展，财富和力量的联系日趋紧密，“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⁸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大国关系的性质和形态主要取决于崛起大国对守成大国以及后者主导的国际体系是挑战和颠覆，还是跟进与合作。除了核武器以外的热兵器在战争中的广泛运用，是导致二战以前大国之间相互厮杀的重要因素；而能够使人类毁灭自身的核武器为多个大国共同拥有，有效降低了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二战结束之前，西方列强在争夺世界霸权、瓜分殖民地的过程中，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超过了观念差异。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成为大国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日趋式微。全球化的发展，大国间共同利益越多，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的增强，在不断推进大国关系由敌对、对峙状态转变为竞争、合作状态。

一 二战结束前大国关系

泾渭分明、非敌即友，“对抗与冲突”和“零和博弈”，构成冷战前大国关系的主要方面。

在二战结束之前，尽管大国之间结盟的情况多有发生，但霸权更替、国际体系的改变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大国之间的战争完成的。守成大国主持规定世界政治基本规范，是已有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崛起大国在接近或超过守成大国过程中，往往试图挑战和颠覆守成大国的地位和已有国际体系，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西班牙与荷兰；17世纪荷兰与英国，荷兰与法国，18—19世纪英国与法国；20世纪法英两国与德国，以及1931年美国与日本，都属于这种情况。

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是典型案例。由于两国在崛起过程中挑战守成大国和已有国际体系，引发全球范围内大国兵戎相见，战争不但引发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并导致奥托曼、奥匈、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五个帝国的崩溃，以及英、法两大帝国体系的衰落，无论是守成大国还是崛起大国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20世纪初，德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后，立刻向后者的世界领导权发起挑战，谋求建立与英国舰队规模相等的海军，在世界范围内争抢殖民地。德国的挑战行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前期还有俄国）的联合力量打败后，德国的军人、政客、知识分子和民众普遍不能接受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条约，最终导致希特勒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日本明治维新后，首先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了清帝国，颠覆了在东亚已经持续上千年的“中华秩序”，为建立自己的区域性霸权排除了障碍，并企图独自吞并中国。但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在美国主持下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

⁷基辛格曾将国际关系体系划分为“稳定性体系”和“革命性体系”。在稳定型国际体系下，国家行为者都对外交政策的手段与目标持有一致的看法。而如某个秩序中的一个大国对现状强烈不满并力图加以改变，这种秩序便是革命型的。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23—129页。

⁸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前言第41页。

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在中国实行“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不允许日本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者势力范围。因此，日本于1931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华，公开挑战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区域的领导地位，甚至不惜退出国际联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力图联合其他挑战者（德国和意大利），颠覆既定的世界秩序。

二战前大国与大国之间的战争不仅发生在西方列强之间，也发生在“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如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由于这类战争发生在所谓的国际体系之外，因此，非但没有得到列强的制止，反而获得支持。1900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美国联合出兵中国，占领北京，这八个国家是当时世界主要八个“新兴大国”。

二战结束前大国关系之所以长期处于敌对和战争状态，首要原因在于“坚船利炮”的广泛运用，增长了列强征服对手，称霸世界的野心；在主张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引下，许多大国认定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确定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若成为世界霸权，必须挑战守成大国，颠覆已有国际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列强“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充分瓜分殖民地”而展开殊死较量，而德、意、日三国为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不惜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另一个原因在于现有国际体系不够完善，缺乏应有强制力和约束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战胜国成立的国际联盟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全球国际事务具有重大影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成立的宗旨为“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间的和平与安全”。但由于美国不参加国际联盟，英国再也不肯充当“世界警察”，国际联盟以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很快就遭到严峻挑战。⁹

无论守成大国之间，崛起大国之间，还是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都缺乏密切的经贸往来，也是导致二战前大国关系欠佳的重要原因。在1870年至1914年期间的金本位和金汇兑本位时代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初级产品，特别是食品和原料占据了世界贸易的大部分份额，而制成品则不到40%，深刻表明西方工业国之间的贸易十分有限。

表 1: 1876-1928 年世界贸易流向（单位：%）

	发达经济体间	发达经济体间与发展中经济体间	发展中经济体间
1886	45.0	51.0	4.0
1913	43.0	52.0	5.0
1928	40.0	49.0	11.0

资料来源：戴维·赫尔德 等著：《全球大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8页。

二战结束前的美英关系是惟一的崛起大国超越现存强国而没有发生冲突的事例。1890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两者之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基本上实现了和平崛起。英国之所以“容忍乃至欢迎美国的崛起”，¹⁰没有视美国的崛起对其构成威胁，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建国后，长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所谓“中立”立场，尽量避免直接挑战英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与先前崛起的大国不同，美国不是通过领土扩张，而是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取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这不仅有益于美国，对无疑有益于包括英国在内其他国家。此

⁹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推荐序二，第17页。

¹⁰ 贾庆国 理查德 罗斯克兰斯：《中国和美国正在走向冲突？》，《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第7-8页。

外，美英两国拥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如自由、民主等，也有助于相互间的理解与沟通。

二 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

所谓冷战，是指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至 90 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军备竞赛状态。这一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一如 1948 年摩根索所说：“两个巨人警惕而又怀疑地相互对视，……进而遏制或被遏制、征服或被征服、摧毁或被摧毁就成了新外交的标准用语”。¹¹ 而同盟的破裂、国际格局的分化，以及大国的复兴和重新崛起，则使这一时期的大国关系充满变数。

大国关系主要特征是分裂、遏制和紧张。先是美苏战时同盟的破裂，随后欧洲国家分裂成两大集团，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横向扩散。以 1947 年 9 月在苏联的主持下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为标志，战后的世界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美国力图以经济力量打开全球门户，推进世界经济自由化。1947 年，美国开始实施旨在恢复欧洲战争创伤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将西欧经济纳入北大西洋贸易体系中。苏联争锋相对，同年提出“莫洛托夫计划”，推行高度集中的、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的、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意在将其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变成封闭的经济区域。随着 1949 年 1 月经互会的成立，东欧经济完全纳入了苏联的轨道。美苏分别成立了互相敌对的军事集团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越演越烈。尽管美苏之间没有直接交手，但经常处在战争的边缘，且一方与对方的代理人以及双方代理人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

“冷战时期国际系统呈两极霸权结构，霸权国与主要挑战国的争斗是霸权国国际战略形成的主要国际因素，从根本上影响到霸权国和系统中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¹² 在这一霸权结构中，美国和苏联分别扮演了守成者和革命者的角色。虽然苏联在军事实力方面基本上与美国处于对等的地位，但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包括联合国，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C)即后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经济秩序，几乎都是由美国主导。颠覆这一体系和秩序，是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要任务。

中国在冷战时期扮演了跟进者和挑战者双重角色。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采取一边倒政策，加入苏联阵营，并按照苏联模式发展自己，且如同日本和欧洲得到美国的援助一样，在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等得到苏联大量援助，为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之前，中国和苏联联盟构筑社会主义阵营，挑战美国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斯大林去世后，中国开始挑战苏联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力图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心，后来又肩负起领导第三世界推翻“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历史重任。当然，中国对苏联的超越主要不是表现在经济方面，而是主要表现在革命经验的积累、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的正统性等方面。

¹¹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年，第 293-294 页。

¹²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06 页。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国际关系格局在两极格局内出现了所谓“中美苏大三角”。中美之间直到1979年建交，处于一种复杂和微妙状态：两国互为战略倚重对象，与此同时，美国依旧是中国的革命对象，中国依旧是美国遏制和孤立的对象。

在西方阵营中，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呈现出稳定性。在二战后的绝大多数时期，美国都支持日本和德国实现经济振兴。在美国主导的安全框架下，日本没有重复寻求领土扩展的军国主义道路，而是全力振兴经济，于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包括苏联）。德国同样在美国的帮助下全力发展经济，分别于1959年和1960年超过了法国和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日本一样，这次德国的崛起也是和平的。但是，与日本不同的是，这次德国的崛起是与欧洲邻国的和解与融合同步实现的。”¹³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战争，尽管其代理人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双方以及其他大国都拥有了足以毁灭人类的核武器，确立和维持了“恐怖平衡”。

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意识形态扮演了关键角色。美苏两国“都属于地球上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¹⁴美国认为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化身，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则意味着极权和专制，是自由民主的主要威胁，美国具有无可争议的责任去同它斗争。而在苏联看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与垄断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式揭开了冷战序幕的杜鲁门主义，就是用“极权主义”和“自由制度”的两极对立来说明世界政治，苏联则随后针锋相对地提出两大阵营根本对立的口号。

美苏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对立，很大程度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现代和传统，民主与专制之间对立在新形势下延续和发展。美国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便形成了一种反共意识，而这种反共意识又和美国历史所孕育的自认为美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优越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美国有责任将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移植的天定使命观相结合。二战中与德国和日本作战的经历再度引起了美国人对独裁统治的极端厌恶，强化了美国人有关美国式的民主政体才能创造一个和平与安全的世界的观念，从而“将法西斯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都视为专制政体并具有侵略性，认为它们都在海外搞敌对扩张，因此必须受到约束。”¹⁵

这一时期，西方阵营内部主要国家之间也存在矛盾，但同盟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破裂，合作而非对抗一直是大国关系的主要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与他们都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能够按照国际规则处理相互之间关系；国家利益是他们处理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

东方阵营内的国家关系则呈现出一定的脆弱性和动荡性。化友为敌的情形不仅发生在中苏之间，也屡屡发生中苏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内缺乏主权意识、国家利益观念和平等观念，国际主义压倒民族主义，阵营利益取代国家利益，国家关系成为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的

13 贾庆国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中国和美国正在走向冲突？》，《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第11页。

14 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306页。

15 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62页。

党内关系和党际关系的延伸，即主张大国关照、领导和支配小国。在这种国家关系中，缺乏各国一致认同的政治准则以及制约相互行为的妥协机制。

斯大林去世后，争夺话语权成为中苏两党解决相互间路线和政策分歧的基本手段，而目标则在于争夺国际共运的主导权。对于美国领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毛泽东和中共主张革命，赫鲁晓夫和俄共则主张缓和，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关系。因为当时各国共产党都认为只有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从而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¹⁶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存在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准则。共同利益就是避免战争，共同准则是在冷战对抗、特别是在危机中将此置于最优先地位。¹⁷两个国家在经济上没有以任何重要的方式相互依赖，也是导致双方没有发生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苏联人和美国人在经济领域相对来说是无所畏惧的。……相互之间只有很少的经济杠杆可用。……从国际稳定的角度来看，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色是两个最能自给自足的国家，这或许是一种幸运。……它们相互独立的程度本身构成了对两国关系稳定的一种结构性支持。”¹⁸

但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之间很少发生经贸往来，世界贸易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显然也有利于相互之间的分裂和对抗。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内容很长的电报，他提醒人们注意，美国之所以可以与苏联对抗、决裂而没有什么风险，是因为美国同苏联的“利害关系微乎其微”，“在那里，我们没有投资需要保卫，没有确实存在的贸易机会会丧失。”¹⁹表2表明，1963年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与西方工业国贸易区发生的贸易额仅是西方工业国贸易圈之间贸易额的1/20。

表2 1963年世界贸易圈（单位：百万美元，隔岸价格）

目的地 \ 产地	工业国贸易区	发展中国家贸易区	苏东国家贸易区
工业国贸易区	69.285	21.900	3.495
发展中国家	22.140	6.685	1.670
苏东国家贸易区	3.505	2.465	12.275

资料来源：WTO：《国际贸易》1981/1982日内瓦，1982年。

三 冷战后大国关系

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盟友与敌人的界限日益模糊，以“亦敌亦友”、“挑战与利益同在”、“竞争与合作并存”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日益浮出水面。

¹⁶徐天新 沈志华：《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284页。

¹⁷牛军主编：《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¹⁸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297-298页。

¹⁹ George Kennan:《长文电报》(英文)，莫斯科，1946年2月22日，<http://www.ntanet.net/KENNAN.html>

至少在官方文件中，中、美、俄、法、英、德和日本大国之间普遍建立了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如美俄建立了和平伙伴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法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中日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英表示要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俄法确立了发展优先伙伴关系，俄日努力发展真正的伙伴关系，等等。

冷战结束以来，对于现有守成大国和国际体系而言，几乎所有崛起的大国都是跟进者、参与者，而非挑战者、颠覆者。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第一次又革命性体系转变为稳定性体系。

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正在崛起的大国，无不力争成为现有国际体制和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完善者，通过遵守和利用现有国际秩序和规则发展自己。他们高度重视对外经济关系，不断增大自身与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互信。秦亚青等人所指出：“20 国集团是保障国际秩序的需要，因为保证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合作意味着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金砖国家不寻求挑战现有秩序，而是试图维护并改善现有秩序；不寻求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而是均以与对美关系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不寻求以制衡原则结盟对抗原有大国，而是通过谈判方式达成合作结果。”²⁰印度和巴西力争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2012 年 8 月，经历了 18 年的漫长谈判，俄罗斯终于如愿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都是现成的例子。

冷战后新型大国关系的出现与下述因素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其一，世界主要国家拥有核武器的状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战争作为解决大国竞争手段依旧缺乏可行性。“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大国都拥有了核武器，或者有核保护伞。如果大国竞争的目的是谋求自身利益或提高国家威望的话，核武器的破坏力就使得这些目的无法通过军事对抗实现。在这种情形下，各国不得不寻求别的途径来处理与对方的关系。”²¹

第二，意识形态对大国关系的影响不断弱化。苏联解体后，弗兰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结”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的终结”，今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不再会有关于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即意识形态的争论。²²时至今日冷战思维的残余依旧存在的现实，表明这一判断言之过早。但随着全球化迅猛发展，信息多元、思想多元、价值多元、文化多元日益成为潮流，“自由化与多元化的对立面不再是以国家为名的赤裸裸的思想专制，而是以软性的社会凝聚力、社会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等等为核心价值的思想。……这一意识形态矛盾的性质，决定了对立双方都无法建立有类似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那样具有代表性的、强有力的跨国组织。同时，国家作为意识形态或宗教符号的现象，也正在退出历史舞台。”²³

第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意义日趋显现。“全球化是对二极结构的否定，全球治理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尝试性规定。”²⁴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每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与整体世界息息相关，从而将各国利益更加紧密地缠绕在一

²⁰秦亚青主编：《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年，第 23 页。

²¹贾庆国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中国和美国正在走向冲突？》，《国际经济评论》2011 年第 3 期，第 13 页。

²²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1 页。

²³王辑思 唐士其：《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国际政治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8 页。

²⁴陈玉刚：《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关系和中国的体系战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评论：《中国与诸大国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 页。

起；而全球问题的解决具有正和性，世界各国均可从全球治理中受益。在这一背景下，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都愿意顺应历史潮流通过合作的方式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完善现有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

世界主要大国之间普遍建立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相互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盟和制衡关系已经不能反映大国互动内容的全部，高度的相互依存使得许多大国关系处于联盟和制衡之间的大量模糊地带。

四 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

中国 2007 年 GDP 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010 年，GDP 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历史证明，中国已通过和平方式，成为名符其实的崛起大国。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对其他大国关系存在重要的制约和影响。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唯一出路和必然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中国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从现有国际体系的革命者、颠覆者到支持者、参与者和完善者的角色转换。现今，中国已经全面参与到全球和地区几乎所有国际组织之中，与各种国际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

“毋庸讳言，中国对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某些方面有着这样和那样的不同看法，并想对其进行改革，但是，它是想改革而不是破坏这个世界秩序。”²⁵

2004 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记者会上指出：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²⁶《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尽管对中国先后采取过“遏制-接触”、接触-遏制、融合-牵制、竞争-遏制等多种应对举措，但其主要目的无不在于防止中国挑战其霸权地位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已认可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在对华关系上，倾向于接受中国的倡议，开创“竞争—合作”的这一新型关系模式。

2005 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影响未来世界的大国，是一个维护而不是试图改变现行国际体系的大国，今天的中国绝非四十年代后期的苏联可比。因此，美国需要选择与中国合作，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与美国共同经营国际秩序、共担风险和责任，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²⁷2006 年，美国新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一个有能力而且愿意发挥世界经济大国作用的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利益之所在。我们不惧怕中国的竞争。我们欢迎这种竞争。我们希望中国担负起自己作为国际社会负责

²⁵ 贾庆国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中国和美国正在走向冲突？》，《国际经济评论》2011 年第 3 期，第 12 页。

²⁶ “在和平中崛起”，<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46676/3333094.html>

²⁷ 顾国良，“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1187267.htm>

任的一个成员的职责并找准自己的位置。”282007年，基辛格在中科院发表演讲时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非常巨大的一些挑战，我们需要中国的崛起。我们也不应该去阻止它的崛起，我们必须了解的，就是合作，合作是非常关键的。”²⁹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主张：“美国继续推进与中国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全面的联系，欢迎中国与美国一起承担负责任的领导角色，坦诚在人权领域的不同看法，使之不妨碍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³⁰

中美之间“冷战式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较量也越趋于平淡与温和。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依旧坚持西方发展理念和模式的普遍意义，主张拥有美国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所有国家繁荣幸福的前提，但由于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以及“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破产，使美国“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这种“一元论宗教和意识形态”³¹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不得人心。相反，中国有关“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不同国家的发展都应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任何国家都不能强求一致将自己的发展理念和模式推而广之”，“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³²的主张，却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赞同。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美两国拥有的共同利益和面临的共同挑战越来越多。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于2009年9月发表《中国登场：构建一个全球关系的战略框架》的报告，明确指出“没有北京和华盛顿的联合行动，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包括全球金融动荡，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保障）是难以想象的。”³³

中美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也降低了两国间产生严重对抗的可能性。目前中国的GDP已占美国40%，是美国的最大债主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一个新型国家在崛起之时，守成大国一方面力图遏制其发展，另一方面又与其发生日趋紧密的经济联系。正如2012年4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演讲中所说：“在不到35年的时间里，我们两国从几乎谈不上有任何联系发展到彻底、无法回避地相互依存。这种情况需要双方均在思维与方式上作出调整，今天的地缘政治不允许我们进行零和游戏。……一个兴旺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兴旺的美国也对中国有利。”³⁴

²⁸ 美国新财政部长保尔森首次访华备受关注，<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4832533.html>

²⁹ 《基辛格在中科院发表演讲：我们需要中国崛起》，《北京晨报》，2007年4月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4/04/content_5931314.htm

³⁰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³¹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编者絮语第2页。

³²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³³ Abraham Denmark and Nirav Patel, “China’s Arrival: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 September 2009,

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20China's%20Arrival_Final%20Report.pdf

³⁴ 《希拉里军校演讲频提中国：中美应坐下来讨论敏感问题》，《环球时报》，2012年4月12日。